



辽宁省“一带一路”出版基地
大连海事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顺风相送》研究

刘义杰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辽宁省“一带一路”出版基地
大连海事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顺风相送》研究

刘义杰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刘义杰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顺风相送》研究 / 刘义杰著. — 大连 :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7.10

(“一带一路”系列丛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ISBN 978-7-5632-3566-7

I. ①顺… II. ①刘… III. ①航海—史料—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U67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6467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凌海路1号 邮编:116026 电话:0411-84728394 传真: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海大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幅面尺寸:155 mm × 235 mm

印数:1 ~ 1500册

印张:37

字数:450千

出版人:徐华东

策划:徐华东

责任编辑:杨森 于孝锋

责任校对:魏悦

封面设计:解瑶瑶

版式设计:解瑶瑶

ISBN 978-7-5632-3566-7

定价:118.00元

前 言

我对海道针经的关注虽然很久,但始终未曾见过原始样态的海道针经是个什么样的“舟子秘本”。直到2011年春夏之交,同窗谢必震教授送了我一套《顺风相送》的拷贝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顺风相送》的本来面目。如获至宝的我赶紧将它拿来与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中的《顺风相送》校注本进行了比对,解开了早先的一些困惑。原来,向达先生当年用来做校注的底本是他1936年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作交换馆员时抄录下来的抄本,而非原始的底本。当1959年向达先生开始校注《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时,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到牛津大学去重新校勘一下自己的抄本,在他转录的抄本基础上校注出版的《顺风相送》,有所差错和遗漏在所难免。为了给研究这部在我国航海史上最为珍贵的海道针经一个较好的版本,我用《顺风相送》的拷贝件对校了向达先生的校注本,将重校的结果撰成《〈顺风相送〉校勘与编成年代小考》一文,参加了2012年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得知校注本与抄本之间存在着大量误差后,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建议我应尽快出版一本经过与抄本校订过的“新《顺风相送》”,以便学界能够在一部完整无误的校勘本上开展对《顺风相送》的研究。

受此鼓励和大家的期盼,我开始了重新校勘《顺风相送》的工作,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推出新版《顺风相送》。这对于做出版工作的我来说,似乎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只需要将拷贝件原汁原味地转录出来,再根据向达先生的点校本重排一遍就好了。但是,当我开始重新点校时发现问题有些棘手了,要点校海道针经,基本的要求是对我国古代帆船航海时使用的航海罗盘要有基本的了解。但什么样的罗盘是航海使用的呢?于是,我开始寻找帆船航海时期使用的航海罗盘,试图从实物入手,掌握航海罗盘的布局和使用方法,然后再去解读《顺风相送》中的针路。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些博物馆中展出的介绍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展品,很多都是我们日常习见的风水先生使用的地理罗盘。一些专业著述中对航海罗盘的介绍也大多语焉不详,甚至张冠李戴。总之,关于航海罗盘问题,乃至指南针问题,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对我来说,不能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旁门左道。为了找到真正的航海罗盘实物,我寻访得知,位于福建福州闽江口长乐市的琴江村曾是清朝水师的营地,现在尚有清军水师的后人收藏的航海罗盘。经过努力,我终于在这里见到了清朝水师遗留下来的一只航海罗盘,对航海罗盘的形制、大小有了认识。再后来,我在海南岛的渔民家中,又见到了几只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的航海罗盘。清军水师留存的航海罗盘与海南岛渔民使用的航海罗盘虽然相隔千里之遥,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制式,一样的使用方法。因为见证了航海罗盘的实物,终于可以将其与《顺风相送》中的针路进行比较了,使我踏实了许多。但另外一个问题又开始困扰我,即在帆船航海时期,就像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的,掌握罗盘的火长决定了航海的成败与众人的生死,那这个掌握火长的船员到底在船上承担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达到“生死系焉”的程度呢?掌管罗盘的人为何又称火长呢?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和历代学者的著述,我又再次陷入困境。火长一词在南宋初出现,但到明代中叶以后,在一些著述中不知怎么地又被称作了“伙长”,两个不同

的称谓引申出对火长截然相反答案,导致后来的研究者也很茫然。经过深入的研究,我撰写了《火长辨正》一文,发表在《海交史研究》上,自认为在有关火长的诸问题中,有了清楚的认识,为校注针路做好了前期工作。

《顺风相送》与其他古籍不同,在1936年发现《顺风相送》抄本之时,就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它展开了研究,到2014年接近80年,可谓硕果累累。乘着2014年香港海事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联合在香港海事博物馆展出抄本《顺风相送》和举办“明代海洋贸易、航海术和 underwater 考古新进展国家研讨会”之机,我撰写了一篇《〈顺风相送〉研究八十年》的综述性文章,总结了近80年来海内外专家学者在《顺风相送》研究上所获得的各项成果和仍然存在的各种问题。至此,对《顺风相送》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校勘和注释了。

事实上,我原本也只是准备将《顺风相送》简单地在向达先生的基础上做一些校勘然后出版,目的也很简单,就是给学界提供一个完整和准确的本子。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努力后,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将《顺风相送》进行“拆解”,在点校的基础上,结合针路的注释过程,对我国帆船航海时期,尤其是明代的航海技术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解剖,将自己多年来因为要校勘《顺风相送》而展开的航海技术史研究的一些认识和见解融入其中,使之成为一本以《顺风相送》针路为基础的,解构我国古代帆船航海时期航海技术的一部学术性著作。这样一来,原本的校勘就变成了研究性的写作,对于一个业余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人生多有幸事!能将我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作为一本研究性的著作出版原本仅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感谢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社长徐华东先生,是他力将拙作列入该社策划出版的“一带一路”系列丛书选题中,并有幸地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我的出版愿望因此实现,实在是拜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社长及他的同事所赐。当在2017年的年尾终于完成了书稿并将其交给出版社时,自己

突然觉得很是惶恐！才疏学浅的我，真的能如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将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史上的诸多问题都一一给出合理或适当的解释了吗？我想，书稿中存在着不完善或错误是肯定的，好在来日方长，还有补足的时候。只是希望由于此书的出版，能够给航海史研究，尤其航海技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标本，能促使该领域的进步，私心以为可，故有此不揣简陋之作也。

这部书稿能够写成，得到的帮助非常之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赠阅抄本《顺风相送》拷贝件的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教授外，还要特别感谢时任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长的赖近义教授。是赖教授将个人收藏的《海洋汇刊》（第一辑）慷慨相赠，使我得以真切地了解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动态。感谢《顺风相送》研究资深前辈、我的老学长、香港南溟网网主陈佳荣先生，在我学习和研究航海史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提携、提供无私的帮助。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地打开他的南溟网寻求答案，由此少走了许多弯路，纠正了很多错误。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香港大学钱江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聂德宁教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郑一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汪前进教授等众人的帮助和支持。书稿能够顺利完稿，还得感谢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杨淼主任的不断督促和加油。最后，感谢我的妻子李新老师，是她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使我从外行变成内行。

对《顺风相送》的研究和注释，多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囿于个人的能力与见识，其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甚至误读。本书出版之后，如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是我衷心所期望的。

刘义杰

2016年11月

目 录

第1章 抄本与校勘本	1
第1节 抄本	4
第2节 校勘本	10
第2章 作者与年代	19
第1节 作者	22
第2节 年代	33
第3章 航海罗盘与海道针经	45
第1节 航海罗盘	49
第2节 针路簿	82
第3节 更路簿	103
第4节 山形水势图	120
第4章 东洋针路	139
第1节 琉球针路	144
第2节 日本针路	174
第3节 菲律宾、文莱针路	183
第5章 西洋针路	193
第1节 越南、柬埔寨针路	196
第2节 泰国、马来西亚针路	204
第3节 印度尼西亚针路	214

第6章 海外针路	221
第1节 日本、菲律宾针路	224
第2节 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针路	228
第7章 印度洋针路	261
第1节 印度洋东部针路	264
第2节 印度洋针路	268
第8章 国内针路及山形水势图针路	271
第1节 国内针路	274
第2节 山形水势图针路	278
第9章 “序”·诸神·“更”及其他	295
第1节 “序”论	298
第2节 祝文释读	310
第3节 “更”解	317
第4节 占风与验潮	332
第5节 针法与观星法	356
第6节 其他	374
第10章 结 论	377
附录一 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	381
附录二 《顺风相送》影印件	390
附录三 《顺风相送》句读	517
附录四 传统航海罗盘48向针位与现代360°罗盘对应表 ...	555
参考文献	556
索 引	562

第1章

抄本与

校勘本

自从航海罗盘发明以后,帆船航海进入计量航海时期,航海家可以根据航海罗盘提供的航行方向即针位规划航程。将航线上的航向指示(针位)记录下来而形成航海指南,这就是我国航海史上独有的针路簿。这些针路簿仅在海上航行时由掌握航海罗盘的火长使用,用来引导船舶驶向既定的海域和港口。早期形成的针路簿都是由火长长期的经验积累而记录下来的抄本,不易长期保存,传世极少。“舟子各洋皆有秘本”^①,就是指这种由火长记录和使用的针路簿。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的抄本《顺风相送》,便是其中的一种。

① 黄叔瓚:《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崁笔谈·水程》,据《四库全书》本。

第1节

抄本

2014年3月至6月,香港海事博物馆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Oxford's Bodleian Library)联合在香港海事博物馆举办“针路蓝楼:牛津大学珍藏明代海图及外销瓷”展览,展出了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的《顺风相送》(如图1-1所示)和《指南正法》两部抄本的原件,这是《顺风相送》离开故国37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据记载,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英国坎德伯里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大主教(Arch. Laud)赠送给博德利图书馆的大量文献中包含有一批东方文献,其中就有一部来自中国的针路簿抄本。关于这个针路簿抄本的来源,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为2017年2月出版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做的序中做了一个推测:“像他^①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他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中文图书。这些书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从东南亚华侨那儿购得,在阿姆斯特丹被拍卖并在全欧洲流转。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最大的单笔藏书,包括博德利个人通过他在阿姆斯特丹的经纪人购得的一些书,及一些被别人收购而后转到图书馆的图书。大主教威廉·劳德收藏的抄本大都直接来自欧洲大陆。《顺风相送》据说此前为一个欧洲耶稣会所拥有。”^②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抄本极有可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请人在雅加达,即《顺风相送》针路中的咬留吧按照火长手中的针路簿抄书下来的,然后带回欧洲。

① 指威廉·劳德。

② 何大伟:《序》,见无名代:《顺风相送 指南正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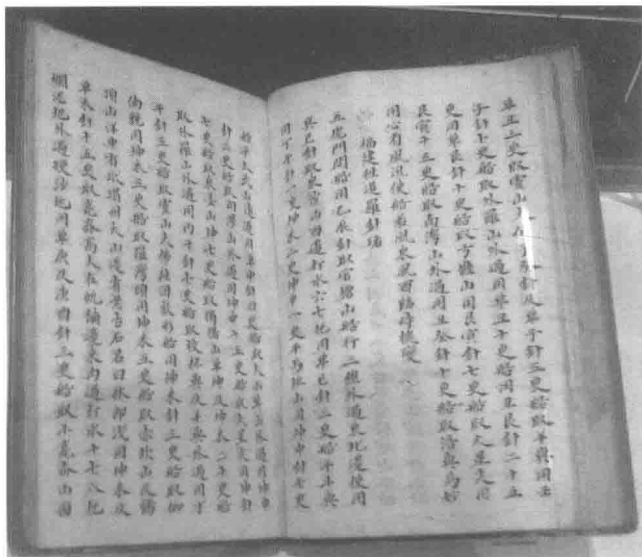


图 1-1 香港海事博物馆展出的《顺风相送》

● 1.1.1 沈福宗

与其他东方文献一起入藏的这部手抄本,原本无名,全书共 66 页 132 面,线装,正文用工整的小楷抄写在宣纸上,极少出现误抄更正的现象。从会展展出和博德利图书馆展示的图片看,抄本至今保存完好,仅首页略有破损。抄本入藏时,以捐赠者冠名,故在博德利图书馆中,它登记在“劳德”名下。直到 1687 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才为这个抄本题写了书名——《顺风相送》。

据考证,沈福宗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出生在江苏省江宁府(南京)一个天主教徒之家,从小皈依并跟在华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学习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 年),柏应理奉召前往罗马汇报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临行前,决定挑选几名中国教徒一同前往,时年 24 岁的沈福宗是被选中的其中一人。但是随着其他人的中途退出,沈福宗便成了唯一一个被带往欧洲的中国教徒,甚至有可能是第一个踏上英伦三岛的中国人。1681 年 12 月 5 日,沈福宗等人随柏应理从澳门搭乘一艘葡萄牙商船动身前往欧洲,但由于这艘船到达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时误过了季风,他们不得不在雅加达等待了一年后才搭乘一艘荷兰船起航前往欧

洲。1683年,沈福宗到达葡萄牙,先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所神学院学习,并取了教名称米歇尔·阿方索(Michel Alfonso),简称米歇尔·沈或米歇尔·沈福宗。沈福宗后从葡萄牙到意大利罗马继续学习,并于1684年随柏应理到法国访问。1685年应邀访问英国,受到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接见,认识了时任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海德拜沈福宗为师,学习中文。1687年6月,海德请沈福宗到牛津大学一道做研究。沈福宗帮助海德完成了《中国度量衡考》一书的撰写,并为博德利图书馆中收藏的中文文献进行分类编目。也就是在这次的编目过程中,沈福宗将原本无名的这本针路簿抄本的首页上添加了“顺风相送”四个字作为书名,并用罗马字母在这四个汉字旁注了音(如图1-2所示)。现在在《顺风相送》的封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沈福宗手写的“*Xin fun siam sum*”以及托马斯·海德书写的“*Liber docens navigationem partium maris prope Chinam*”(一部关于在中国附近海域的航海书)。与抄本中的书法相比,沈福宗的毛笔字还欠火候。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欧洲游历了11年之久的沈福宗和柏应理一同搭乘一艘荷兰商船回国,在到非洲西海岸莫桑比克附近时,沈福宗突然染病,并于9月2日去世,终年36岁。^①

沈福宗使用“顺风相送”作为该针路簿的书名,显示出年轻的沈福宗是个博学多才并对中国航海有较深刻认识的人。沈福宗生活的时代,我国的帆船依然可以与西方的船舶并驾齐驱。依靠风帆作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祈求“一帆风顺”,如南宋时泉州主管海外贸易的官员每年要为出航的船只举行祈风仪式,一些海船上也会挂出“顺风相送”的飘带来祝福自己。在海船起航前举行的祈祷仪式中,也往往将“顺风相送”作为主要的祈求目的,民间甚至铸有“顺风相送”的花钱(如图1-3所示)作为压胜物或配饰,祈求航行安全。可见,沈福宗将吉祥语“顺风相送”作为这本针路簿的名称是非常妥当的。在海南岛渔民使用的更路簿中,有取名《顺风得利》的,意思与此相同。

① 有关沈福宗的生平资料,均采自潘吉星的《沈福宗在17世纪欧洲的学术活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2卷第3期],以及卜正民著,刘丽洁译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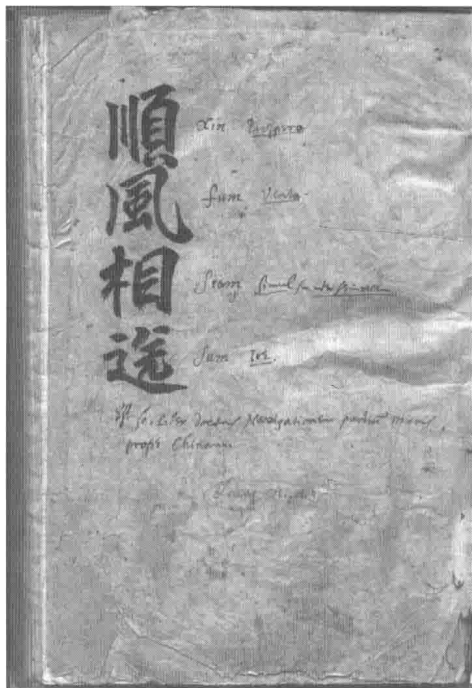


图 1-2 《顺风相送》封面



图 1-3 “顺风相送”花钱

● 1.1.2 向达

在沈福宗第一个以学者身份进入英国并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藏书进行第一次编目之后的247年,该馆迎来了第二个为馆藏中文图书编目的学者,他就是向达(1900—1966年)。向

达,湖南溆浦县人,字觉明,笔名方回。据《向达先生小传》^①,向达先生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先攻读化学专业,1年后转投文史专业,1924年从已改名为东南大学的大学毕业。1924年夏进入商务图书馆任英文见习编辑,1930年,向达先生从上海到北平,出任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由北平图书馆派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交换馆员,帮助牛津大学整理中文图书。”^②1935年12月至1936年7月间,向达先生任牛津大学图书馆临时馆员,负责中文藏书编目^③。正是这次编目工作,使得向达先生饱览了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藏书,《顺风相送》等被慧眼如炬的向达先生发现并加以抄录。1938年秋,向达先生带着抄录好的几百万字的资料回到祖国,原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的针路簿抄本《顺风相送》也就在这时候以抄本的形式回到了故土。

《顺风相送》的内容及其解读将在后面的诸章中展开,对抄本《顺风相送》如何出现在欧洲并被入藏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向达先生也有过说法:“我们推测,此书很可能成于16世纪,由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师带到欧洲,又辗转以入于牛津。”^④较之于后来看到的种种针路簿抄本,我们发现仅有《顺风相送》这个抄本具有字迹工整、误笔极少的现象,说明该抄手是一个文字素养较高的人。同时由向达先生抄录回来的《指南正法》也是一个抄本,字迹前后明显不同,且字体极为平常,可见来自多个抄手。因此,推测《顺风相送》原有底本,抄手依底本照抄而来,与火长使用的针路簿经常涂抹更改,字迹不规范,大量使用简体字和异体字差别较大。

抄本何时进入欧洲,又如何来到劳德大主教之手,只能猜测,但

① 阎文儒、阎万钧撰:《向达先生小传》,见沙知编:《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页。

② 沙知:《向达的自传》,《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页。

③ 徐俊:《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见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页。

④ 向达:《顺风相送·序》,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